

東北 一鬼

【四卷】

東北 一鬼

张庆军 刘冰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六章 相煎何急	(299)
1. 大军出征	(299)
2. 铁团威风	(312)
3. 勇懦两难评	(319)
4. 龙潭斗勇	(342)
第七章 反目成仇	(347)
1. 血腥黄埔	(347)
2. 曲径唯通	(385)

第六章 相煎何急

1. 大军出征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
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
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
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
吊民伐罪，歼厥凶首，复我平等，
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
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
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嗟我将士，一德一心。毋望耻辱，
毋惮艰辛。毋惜尔死，毋偷尔生。
壮烈之死，荣于偷生。嗟我将士，
保此人民。遵守纪律，服从命令。
惟纪与律，可以致胜。生命为私，

纪律为公。生命为轻，命令为重。
嗟我将士，团结精神。激始激终，
相爱相敬。毋惧强敌，毋轻小丑。
万众一心，风雨同舟。我不杀贼，
贼岂肯休。势不两立，义无夷犹。
我不牺牲，国将沉沦。我不流血，
民无安宁。国既沉沦，家孰与存。
民不安宁，我孰与生。嗟我将士，
共赋同仇。革命不成，将士之羞。
嗟我将士，如兄如弟。生则俱生，
死则俱死。存亡绝续，决与今兹。
不率从者，军法无情。^①

——北伐誓师词

在“中山舰事件”过程中，阻挠、延缓北伐大计，一直是蒋介石攻击中共和苏联顾问的重要理由。其实，关于进行北伐的具体事宜，他也根本没有作好准备，他把精力几乎全部放到了权术运用方面。

当时，单从敌我双方态势看，广州国民政府是处于劣势的，它的主要对手，分别是三股北洋军阀势力，一为声名赫赫直系头目吴佩孚，此人与陈炯明一样，也是秀才出身，但文韬武略、气魄胆识却远胜于陈，麾下将士堪称貔貅之军，攻守俱佳。本有夺天下之志，却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因冯玉祥倒戈而惨败。但旋败旋起，宣称受十四省拥护，控制湖南、湖北、陕西、河北、河南一

^① 《申报》，1926年7月15日。

带，有兵 20 万。声势一时极盛。

二为所谓北洋系后起之秀孙传芳，他据有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拥有兵力 20 万，此人极善观变，趋重就轻，并非贪生怕死，无能之辈。用兵之长，在于集中优势，一鼓作气，所谓一箭定江山。他与张宗昌皖北一战，就充分体现了他的作战风格，也奠定了他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一代侠女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也正是在这一战中成为孙传芳的枪下之鬼，从而引发施剑翘红颜一怒，于佛堂内击毙孙传芳，谱成民国史上一段轰轰烈烈的故事。

作为北洋系后辈，孙传芳摆出一副谦逊的姿态，他遥尊吴佩孚，却不与段祺瑞执政府决裂，旋又与奉系张作霖解释嫌怨，虚身下气，但却暗藏雄心，整理地方，以收民心，训练兵卒，以备作战，树保境安民之帜，存见可而进之心，实为一野心勃勃之军阀也。

三为控制着东北各省和平津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此人虽为马贼出身，却堪称一代枭雄，兵强马壮，拥有兵力 35 万人，进退自如，进则入主中原，退则割据为王。

尽管表面看来，敌人强将强兵，然而，在其本身内部，却有不可克服的弱点。果然，湖南军阀唐生智的驱赵（恒惕）之举，立刻在敌军阵营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省东安县人，唐家为当地望族，本人是保定军校一期步兵科出身。说起来，在黄埔军人名人榜中，也可勉强占一席之地。武汉国民政府期间，做过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省长，并任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第三分校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但这毕竟是兼职，让人有不太正宗之感，而他的弟弟唐生明却货真价实的黄埔四期生，这也是唐生智当年为表示输诚革命所表白的一片心迹，其实他是将唐生明送到蒋介

石手中作人质的，没想到唐生明后来却挺有出息。

唐生智当年驱赵时，虽仅不过是湘军中一个师长，但在湖南却是实力派，是省长赵恒惕部下省防军第四师师长，兼湖南督办和水口山督办，控制湘南最富的水口山锌矿。所以，他的第四师是湖南省防军中训练和配备最佳，人数最多的一师，以致逐渐尾大不掉，遂有驱赵之举。

唐生智驱赵取湘，立刻遭到吴佩孚的压迫和威胁，他本与广西方面李宗仁等有约，因此邀其助阵，但广西兵毕竟有限，难以独木支撑，湖南战事呈胶着状态。

刚刚统一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正意气风发，志不在小，他们投入广州国民政府后，所部被编为第七军，李、黄、白分任该军军长、党代表、参谋长。湖南战事一起，李宗仁就立即感觉到，发动北伐的大好时机到来了，于是亲赴广州，策动北伐。

李宗仁乘兴而来，广州方面尽管热情有加，但其主张却遭冷遇，对此，他的体会是：

“党内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我专程来粤策动北伐，显非其时。这些党内纠纷，我在抵穗之前，都不知其详。到此才知广州党政军各首脑部都像‘泥马渡江，自身难保’，何能奢言北伐？”^①

心凉半截的李宗仁，将全部希望放到了蒋介石身上。他们虽未见过面，但李宗仁对蒋却极有好感，他倚为左右手的白崇禧对蒋颇多好评，对白的话，李宗仁是十分信得过的。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300页。

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一生自负，尤其认为在军事指挥方面有独到之处，蒋介石闻其名，试其实，也将他请去黄埔军校为学员授课。其时，黄埔军校已经名声在外，白崇禧受宠之余，也不觉技痒，他认真准备了一番，上了讲台后，不发一言，却在黑板上不厌其烦地大画战斗形势图，极尽详细。白崇禧这一手，如给科班出身的内行军事教官评价，那自会令人钦佩，但他不知道黄埔学生更注重的是实战经验，因此对白氏所露的这一手，并没有显出惊讶佩服之色。

但是，毕竟有人是识货的，军事总教官何应钦顿生英雄相惜之意，白崇禧也是性情中人，加上双方都为保定同学，因此一见如故，后来蒋介石与桂系斗法时，何应钦总是隐隐为白崇禧辩护。

然而，无论怎么样，黄埔军校内整齐肃然的作风，蒋介石的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还是让白崇禧有好感的，李宗仁听了也十分敬佩。因此，他专程去黄埔拜访蒋介石。

李宗仁对黄埔军校的评价是有保留的，他固然夸奖说：“校内井然有序，到处贴满了革命标语，革命的空气，十分浓厚。”却也批评说：“唯就技术观点说，军事教育的水准却不甚理想。因为学生入学程度既不齐，而受训时期也太短。第一、二、三各期连入伍期在内，为时只有六个月，所以军事教育在这短时期中，实学不出什么来。”^① 大有不以为然的态度。

李宗仁批评的是事实，但也有夸张之嫌，黄埔学生军事理论水平虽不能尽如人意，战斗力却不弱，后来连他自己也承认，黄埔学生是支劲旅，虽然他们只受过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但受革命风气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这句评价出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302页。

自于善打大仗、恶仗的李宗仁之口，也就很不简单了。

李宗仁在黄埔军校还见到了周恩来，这时候周恩来在黄埔的地位已大不如昔。“中山舰事件”后，他很注意收敛锋芒，因此没有给李宗仁留下深刻印象。

这一阶段，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呈恶化之势，以堂堂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之尊，屈居为所谓高级训练班（由第一军退出来的中共及左派分子组成）主任。但周恩来却为了组织原则、利益，默默地忍受了。蒋介石却依然不肯罢休，继续施以压力，实际上他就是想把周恩来冷冻起来，让他的才华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后来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时，处于国共两党斗争夹缝之中的张治中郑重地向蒋介石进言：

“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时刻不忘三大政策，而贯彻三大政策，首先可停止两党斗争，加强两党团结。现在北伐就要开始了，为了弥补‘中山舰事件’的影响，显示国共两党的团结，我建议请周恩来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同北伐。”

蒋介石立刻否定说：“政治部主任一职，我准备让邓演达充任。”

张治中据理力争：“邓以带兵为宜，周历任黄埔军校和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经验多，能力强，成绩昭著，总部政治部主任一职还是以周为宜，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尤其国共关系上着眼，请您多加考虑。”

蒋介石沉吟半晌，“你的建议也有一些道理，但我已决定让邓充当，不好中途变卦。现在总部财经委员会一职，尚未有决定人

选，你可征询周的意见，看他愿否接受。”^①他这样搪塞着张治中。

忠厚的张治中尽管觉得财经委员会在总部里不是个重要职务，让周担任太委屈了，但终究是总部的一部分，周参加了亦可显示两党的合作，因此婉转地征询周恩来的意见。

没想到，张治中的建议遭到周恩来的断然拒绝，周恩来是个很好合作的人，如今也对蒋介石感到齿冷，可见内心委屈之深，愤懑之深，他毕竟当时是个仅28岁的青年，年轻气盛，也有常人之情，常人之怒。张治中惋惜之余，一直觉得北伐统帅部没有周恩来参加是一大损失，也是两党后来破裂的因素之一。

黄昏时分，一抹晚霞映在黄埔岛上，五月的广州，正是草长莺飞，繁花似锦，空气中流动着浓郁的花香气息，蒋介石特地将李宗仁留在黄埔，两人对座小酌，蒋介石以当时最时髦的白兰地款客，自己却清水一杯，以茶代酒。

席间无多客，正可以畅谈，李宗仁貌似忠厚，却不木讷，颇善言辞，他滔滔不绝，力陈加速北伐之利害，语言很动人心。

李宗仁再三强调，唐生智既然表示依附广州国民政府，湖南这块北伐必经之地已经唾手而得，但湘局并不稳，唐氏态度也并不坚定，“时机稍纵即逝，不容我们蹉跎之故。语云‘畏首畏尾，身其余几’。”^②希望蒋介石能速下决心，促其北伐早日实现。

蒋介石静听良久，始终沉默，李宗仁再三请其表态，他长叹一声，似有无限感慨：

“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① 余湛邦：《张治中——张治中机要秘书的回忆》第12—13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305页。

李宗仁心中更冷，原来蒋介石对北伐也并不热心，好在此人反应灵敏，察觉出蒋介石的心病所在，因此辩白说：

“正因为我们内部问题复杂，大家情绪不稳，才应该北伐，好让大家有一个新目标，一致去奋斗，以减少内部的摩擦。”

一番话让蒋介石怦然心动，“中山舰事件”后，他虽然占了上风，却也遭到了各方面的指责，如今正好借北伐为题目转移矛盾，并作夺天下之举。

1926年5月21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发布《对时局宣言》，接受海内外请愿北伐。

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迅速着手筹划北伐事宜。

7月1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颁布北伐动员令，令曰：

“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义，保障民族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爰集大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除第四、第七两军先行出发，协同第八军相机前进外；兹特将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各军前进集中计划，各项用表，随令颁发，仰即遵照，此令。”^①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暨蒋介石就职总司令典礼在广州东校场举行，此日风和日丽，万众聚集，典礼台坐北朝南，为了这座礼台的择建，蒋介石曾莫名其妙地发过一通火，因为原先

^① 《中华民国史事记录》，1926年7月1日。

的礼台朝东，他非要改成朝南，并为此延误了两天时间，不少人心里都明白，蒋介石此番出征志不在小，礼台坐北朝南，乃是取南面称孤之意。

整个誓师典礼虽然隆重非凡，军乐喧天，彩帜蔽日，但总让人有不伦不类之感，封建语言、繁文缛节与革命气氛杂糅一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授印，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授旗，委员孙科奉总理遗像，蒋介石一一恭谨接受，心中一热，不由感慨万分，遥想黄埔军校初建之日，孙中山登坛授印，犹历历在目，而“今日不见总理亲授旗印及训诰，而乃使我负领导革命之责，悲痛惶恐之至”^①。

国民党元老中，以滑稽诙谐著称的吴稚晖拖长腔调，在典礼中致训词曰：

“中国革命，远起汤武，新旧主义，当然不同，救民水火，古今一揆。今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全体党员，敬奉总理遗像、党旗、国旗，授我革命军蒋总司令，率全体将士载而北征，牧野之捷，载主休下，一戎斯定，天下为公，尚其鉴兹。”^②

半文半白，古色今香，也亏得吴老夫子，才高八斗，能想得出这番绝妙好词。

作为三军统帅，蒋介石自然要对北伐的战略有个通盘的筹划，他仔细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力量，敌强我弱，乃是不言自明的事。

面临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总兵力，计8个军，约10万人，但其中可能出动的部队，不过5万人。各军军长为：第一军何应钦、第

① 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1926年7月9日。

② 《革命文献》第12辑第45页。

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第六军程潜、第七军李宗仁、第八军唐生智。此外，有以 8 艘军舰构成的海军舰队及拥有飞机 3 架的空军一队，较之即将与其战斗的北方军阀，兵力悬殊有 10 倍之差。

蒋介石在苏联顾问、中共及其他各有关方面帮助参谋下，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将虎踞中原的吴佩孚打倒；继之，击败孙传芳；最后，再和张作霖决战，以统一中国。

出征在即，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仍是他的发祥地——黄埔军校。尽管“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共产党员和左派的影响，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但是，黄埔军校的革命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下来。苏联顾问纳乌莫夫如此确定它的成分：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是共产党员和“左派”，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是右派，其余是中派分子^①。这虽然不尽准确，但毕竟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依据。

因此，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有一件事很有代表性，一个学员以公开的方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语气十分激烈，他警告说：

“你脱离了革命，正在日其一日地变为军阀。如果我们从前把你当做孙博士的拥护者和学生，跟着你走，那么，你要知道，当你背叛人民的那天，我将毫不手软地把你打死。”^②

看来，学生们的情绪是不得不顾虑的。因此，蒋介石专门抽出时间，殚精竭虑，留下了一份言辞恳切的“校长留别全体官长

^{①②} [苏] 亚·伊·切列谱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 401 页。

学生书”。

在这封信中，蒋介石十分动情地称：“本校长受党与政府之委托，督师北伐，所萃萃不能忘者，以我全校官长学生为最。临别赠言，血诚所寄。”切切要求黄埔师生牢记心头。他一再叮嘱，千万不能内讧，千万不能分裂、摩擦。这倒不是他良心发现，而是担心共产党乘他出征之际，在黄埔扩大势力，让他后院起火，所以他觉得有必要抚慰一番。其实蒋介石未免多虑，大敌当前，中共方面正动员力量准备支持北伐，其心胸之宽广非肚量狭小之蒋氏能测。

蒋介石又特地邀请周恩来作了一次长谈，用诚恳的语气说，表示愿意在军校重新实行党代表制，并且不反对在中山舰事件中被逐的共产党员回第一军工作。周恩来听之，淡然一笑，他是个何等明白之人，完全懂得蒋氏用心何在。为了以大局为重，让蒋介石放心而去，周恩来邀集在广州的一些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为随蒋介石出征的各军将领举行欢送宴会。有一次是在太平餐馆，周恩来作东，所请的大都是第一军将领。席间，周恩来风度翩然，妙语连珠，这些黄埔出身的将士，见老师请客，无不豪兴顿飞，把盏言欢，其乐融融，蒋介石闻之也大为心宽。

除中共方面，蒋介石认为要防范外，还有一个实力人物他也是深怀戒惧的，这就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

说起来，李济深也算是黄埔军校正宗元老，历任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教练部临时主任、入伍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教练部少将主任、黄埔军校副校长。表面看来，职位显赫，但在蒋介石排挤下，一直是有职无权，徒有虚名。

现在情况起了变化，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身份镇守广东，并兼广东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军事厅厅长等职，总揽后方大权，黄埔军校已成嘴边之食，焉有不生攘夺之心。

为此，蒋介石特别作了一番周密部署，他利用职权之便，将李济深的第四军4个师抽走了两个师，即陈铭枢的第10师、张发奎的第12师，只剩下陈济棠的第11师和徐景唐的第13师，要防守的地区远及西江和海南岛一带。政治中心广州以及东江、潮州等军事重镇都落在黄埔系重兵控制之中，例如广州的戒严司令和公安局长都由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兼任，海军处长职位留给了黄埔军校管理部长林振雄。这个人也是个极右分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曾经轰动军校的林李殴斗枪击案，他就是其中的肇事者。他原来想借机挑衅，一解心中怒气，反而遭了撤职处分。可见此人之浮躁，但积习难改。后来，他在毫无借口的情况下突然下令所属粤海舰队升火集中省河，卸下炮衣，逼迫李济深离开广州，否则炮火无情。蒋介石虽然对林振雄一片忠心感到理解，却恼火此举未免拙劣和露骨，帮了倒忙，急忙将林调离，痛骂一番，以平息李济深火气和外界舆论。

至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更是不能让李济深插手。按规定，校长不在时由副校长代理。但蒋介石却将所有职权全权委托给方鼎英。方鼎英虽然能理解蒋介石这片苦衷，但玩弄权术方面火候毕竟不到，他在黄埔军校条例上，添设了副校长职权一条兴冲冲地呈蒋审阅，蒋介石看了以后，不得不点拨他一番：

“不要这样，我但给他一个副校长空衔，不理校务；而你是代校长，他仅是一个副校长。这样于你以后办事有帮助的，你若这样明确规定他的职权，反而会处处受到制约，倒不好办事。”

方鼎英不得不暗自敬佩蒋介石棋高一着，自愧弗如矣！

料理完一切善后事宜，7月28日，蒋介石始率兵由韶关向前

线进发，临行前二日，他特地给驻扎在郴州的第一军1师师长王柏龄、2师师长刘峙拍了一封电报，电饬王、刘等严肃行军纪律，原来第一军官兵自恃是总司令的嫡系，骄纵之气于战事未起之时已有所显露，弄得喷有烦言，蒋介石申斥说：

“速遽〔据〕告，此次一、二两师行军纪律未尽严肃，曷胜骇叹。中正平日与尔等申儆者何事，我革命军北伐之目的何在。行军时不能爱护人民，临阵即能杀贼，亦有何用，况纪律稍驰，作战必无胜理。万不料我最有光荣历史之第一军，阅时未久，即已堕落。须知第一军在精神上已成为革命政府之模范军队，今不能严振风纪，败坏第一军之名誉，其实犹小，而减损人民对革命之信仰，其实更大，尔等自问能在革命史上负此重咎否。务须各发天良，严约所部，微细事项，概应严密注意，重大过失，更宜切实查惩。倘再不知奋勉，中正惟有执军法以绳其后。其政治工作人员，尤须与劳苦群众谋切实之联络，勿稍有傲慢轻蔑态度。仰各凛遵勿违。”^①

总司令蒋印

接到蒋介石这份申饬，长得胖乎乎，看上去老实憨厚的刘峙倒是掂了掂分量，他这个人很听话，对蒋的命令从不敢违背；王柏龄却淡然一笑，蒋某人的口气严则严，但不过是家长对淘气的孩子发脾气，用不着认真对待，依然可以我行我素。

蒋介石尚在后方忙忙碌碌、絮絮叨叨之时，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的钟祖培旅已先师进发。1926年5月，先后北上援

^① 毛思诚：《蒋公介石年谱初稿》，1926年7月26日。

唐，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2. 铁团威风

叶挺独立团名义上虽属第四军，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是“铁军”第四军的核心力量。朱德指出：“这支武装为什么这样有力量呢？原因有三：一，军队中有党的组织，二，有政治训练，三，有湖南、江西两省广大的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①

论及黄埔军人在此次北伐时的表现，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和评价。

参加北伐的以黄埔军人为骨干的部队主要有两支，一支是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一支就是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

谈独立团，就不能不提周恩来，他在进入黄埔军校之前，并没有在军队干过，也没有什么军事斗争经验。但却远见卓识地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一再建议共产党必须建立和掌握自己的军队。在他的活动和奔走下，由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一支小型武装力量“铁甲车队”在孙中山批准下由此而建立起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铁甲车队的骨干力量也是由黄埔军人组成，队长徐成章、周士弟（继任）、军事教官赵自选都是黄埔一期生。车队最初隶属于大元帅府，在平定广东反动地主武装时，威风八面，所向披靡。

^① 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自《朱德选集》。

这支铁甲车队后来就成了独立团的骨干力量，周恩来又从黄埔军校调来一批优秀分子充实其间，其中有杨宁，又名毕士梯，共产党员，朝鲜人，任第3营营长。董仲明，即董朗，共产党员，四川人，黄埔一期生，任参谋。吴兆生，又名吴道南，共产党员，黄埔二期生，任第2连连长。卢德铭，四川人，黄埔二期生，任第4连连长。练国梁，共产党员，贵州人，黄埔二期生，任机关枪连连长。蔡晴川，共产党员，湖南人，黄埔二期生，任监视队队长。张堂坤，共产党员，浙江人，黄埔二期生，任担架队队长。曹渊，共产党员，安徽人，黄埔一期生，任第1营营长。许继慎，共产党员，安徽人，黄埔一期生，任第2营营长。胡焕文，共产党员，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任第9连连长。周士弟，黄埔一期生，广东人，任独立团参谋长。

为了让独立团能不受干扰地发展壮大，周恩来又设法将它置于第四军名下，他还有个大计划，在每一个军中都成立一个类似这样性质的队伍，如果实现的话，那么在绝对兵力上，就完全可以和蒋介石分庭抗礼了。可惜，当时中共高层方面如陈独秀之流，对掌握军事力量不感兴趣，这一计划也就搁浅了。

独立团是在1926年5月作为北伐先遣队挺进湖南，支援策应唐生智的。这时候，广东政府内部还在就何时北伐这个问题争执不休时，独立团已经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

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时的表现已经是众口皆碑，无须赘言的了。就军事素质、作风来看，这个团确实称得上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似雷霆闪电，迅猛无伦。打泗汾时，为了执行围困敌人主力的计划，部队奉命沿泗汾河两岸伏击，敌人的炮火进行试探性射击时，战士们躲在民房中一声不响，待到出击时，却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

独立团基层军官多来自黄埔军校，他们不少人都参加过两次